

关注、学习和阅读赵元任

——罗仁地(Randy J. LaPolla)教授访谈录

杨 旭 罗仁地

提 要 石锋教授掀起了“读赵元任”之热潮,在此背景下罗仁地教授指出:赵元任的研究方法基于自然语料的归纳法,强调灵活和开放的思维方式,不受既有理论的束缚;赵元任先生对语言学的热爱尤其值得我们学习,保持对语言学研究的乐趣至关重要。罗仁地还谈到在汉语研究中,不能盲目地套用西方的主语、宾语等概念,而应基于汉语自身的具体特点,更多地关注信息结构。

关键词 赵元任 信息结构 句式 汉语研究方法

2023 年 9 月 11 日,著名语言学家罗仁地(Randy J. LaPolla)教授接受笔者邀请,做了题为“赵元任先生的句子和论元结构概念”的线上讲座(发表版本参罗仁地,2023)。在讲座中,罗教授深入浅出地讨论了赵先生与众不同的汉语句式分析方法,从信息结构角度阐释了汉语的不同子句结构。讲座之后,笔者对罗教授做了专访,提到的七八个问题,都是围绕赵元任先生的。之所以设置这个环节,除了石锋教授倡导“读赵元任”的背景之外,也有笔者个人的原因:一方面是笔者针对罗教授的讲座有很多的困惑和感想,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笔者当时正在为“现代汉语”备课,准备过程中发现很多教材(比如黄伯荣、廖序东编写的版本,即俗称的“黄廖本”)与现有的研究脱节很大,如何把我们积累的新的研究成果整合到教材中去,是语言学工作者应该思考的重大问题。

杨 旭:最近石锋教授提倡“读赵元任”“赵元任的方向就是中国语言学的方向”(石锋,2023a),您自己也写过介绍赵先生的小传(LaPolla,2006、2017),那么赵先生最吸引您的地方在哪里?当代的语言学家应该重点学习赵先生的哪些方面?

罗仁地:我想我和石锋教授的看法类似,主要就是要关注、学习和阅读赵元任。对于赵先生的一些细节问题,我在文章里提出了不同的看法,但这没关系。我主要是喜欢他的研究方法,即基于自然语料的归纳法。他的视野很开阔,思维也很灵活,因此不受先入为主的理论的束缚。你知道,学习理论有一个限制,就是它会限制你的思维方式。我们应该像《笑傲江湖》里的令狐冲学习剑法一样,学了那些招数但也要忘记那些招数,这样你在对决时就是完全自由的。在搞语言学的时候,要做到不受既有理论的限制,保持开放的思维方式。在这方面,我最佩服的就是赵先生。

他不仅有这种方法,而且一直乐在其中。我一直跟我的学生说“linguistics is fun”(语言

学是好玩的),一定要保持这种乐趣,把研究当成好玩的事情。他那个时候不当官,所以避免了很多头疼的事情。我曾当过系主任,这不仅耽误了我的研究,还让我感到紧张和生气。后来我就不再担任这种职务了,告诉学校说,我不要再做官了,我受不了。赵先生一直在台湾“中研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做语言学组的负责人,但他想把重心放到研究之上,所以不去做所长等行政工作,此外也担心蒋介石会注意到他,并利用他。

他的具体分析也值得我们学习,他有很多与众不同的观点,启发我们从新的角度理解语言。我有一个朋友易家乐(Søren Egerod)^①,我特别喜欢跟他交流,就是因为他的看法与众不同,能够对一些你认为没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争议。就像有人打你,但却对你有好处。我觉得这种人是最有用的,我们要学习那些思想开放的人。

杨旭:这次讲座的一个中心议题或关键词是“信息结构”。在中国,信息结构并未受到重视,比如大多数现代汉语教材只是简单介绍了“话题”和“焦点”,并未专门介绍信息结构的各种构式或句式(比如像对待词类和句法成分那样)。陆俭明先生提倡汉语研究重视信息结构(陆俭明,2016),我的问题是:现代汉语教材或者参考语法应该如何应用或落实信息结构的研究?

罗仁地:其实没有信息结构构式和非信息结构构式;所有句型都是为了表达某种信息结构而习俗化的。在汉语中这个事实最清楚,因为可以用信息结构来解释汉语所有的句型,如“(王冕)七岁时死了父亲”。

实际上我也注意到,国内一般不把这些内容看作一个整体,也不把话题和述题处理为相关的概念,而是各自单独来讨论。但这并未触及问题的实质。我们学习时可以借鉴韩礼德(Michael Halliday)和兰布雷希特(Knud Lambrecht)的框架(罗仁地、潘露莉,2022)。我认识韩礼德,和他聊过很多问题,他的框架相对比较简单(Halliday, 1967、1994)。我也认识兰布雷希特,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书时,曾一页一页和他讨论他那本书的草稿,给他提出一些修改意见,不过到最后那本书仍然是晦涩难懂(Lambrecht, 1994;或参 Van Valin & LaPolla, 1997 第5章的简介)。这个杨老师也知道,我们之前在读书会上读过这本书,有时是讨论一章,有时不到一章,每次讲两个小时,也不一定讲得清楚。^②除此之外,还有贡德勒(Jeanette Gundel)的方法(Gundel, 1998)、一些比较形式的方法(如 Vallduvi, 1992),以及布拉格学派的方法(他们的方法一直在演变,现在也比较形式化,如 Sgall et al., 1986)。他们都有各自的分析框架,反映了当时大家讨论的一些问题,最好能够参考这些内容。

当然最重要的是,尊重汉语的实际情况,分析汉语的自然语料。我常说“trust the language”(要相信语言),要按照语言本来的样子来描写,这样就不会出错,因为我们描写的是汉语事实。如果你分析的是编造出来的句子,那么针对句子本身别人就会有不同的看法;但如果是真正的

^① 易家乐(Søren Egerod, 1923—1995),丹麦语言学家、汉学家。哥本哈根大学汉语语言学博士,师从叶姆斯列夫(Louis Hjelmslev)、高本汉(Bernhard Karlgren)、赵元任等著名学者。曾任哥本哈根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语言学教授,北欧亚州研究中心(NIAS)主席,欧洲中国研究会会长,美国东方学会会员,丹麦科学院院士等。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汉语方言研究的论文和专著,有《泰雅语—英语词典》《中国古典文献学》等,并将《庄子》若干篇译成丹麦语。

^② 可参 bilibili 网站“罗仁地读书会”频道,链接: <https://space.bilibili.com/1286572344/>。

口语表达,那么没人可以与你争论,因为自然地说出来的形式是事实。当你用归纳法将信息结构的规则总结出来,你就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分析方法了。

杨旭:和很多其他参考语法相比,赵先生最大的不同之一,在于运用了口语语料(而且在书名中特意强调了“口语”),这一不同是否是他能有那么多独到观察和见解的重要甚至根本原因?此外,赵先生是否有语料库(corpus)的概念,比如他留下的很多书稿或资料,是否包含了我们现在理解的语料库?

罗仁地:赵先生的方法是,注意周边的人怎么说话,搜集这些说法,以归纳法来分析这些说法。这种方法让他发现了很多他没意料到、也不可能意料到的现象,也保证了他可以实事求是地分析它们。此外这种方法还让他意识到语言的多样性,即语言不是像结构主义所说的,是个有很多限制的逻辑系统,反而是人的行为,很自由,没有严格的规律。赵先生是地地道道的结构主义者,但他还是讨论了很多不规律的语言现象,因此他的书很厚。最不规律的是词类,他用了300多页来讨论,但还是没有严格的规律。

关于第二个问题,你可以参考加州大学图书馆的“赵元任档案”。赵先生什么都不扔,所以在他去世后,他的家人将他所有的笔记、日记、著作等都保留了下来。里面的内容非常丰富,商务印书馆正在与图书馆合作,慢慢地出版赵先生的整个档案,2022年出版了他的日记的第一册(一共是46册,参石锋2023b)。此外,他的博士论文也已经出版,翻译是石锋教授等完成的,论文的内容涉及方法论(赵元任,2023)。如果你想看他的笔记本,我可以给你看照片,这是他的笔记本,还有里面的内容(图1):



图1 1954年赵先生到欧洲游学时随身携带的笔记本

杨旭:您屡次强调汉语研究可以抛弃主语、宾语这些来自西方的概念,按照汉语本身的情况来分析。除此之外,是否也要抛弃其他概念,比如语义角色、论元结构等?赵先生提到汉语动词的动作没有方向,在我看来是由于语义关系的丰富或自由,如果过于丰富或自由,那么就可以不用语义角色或者论元结构的路径了。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?

罗仁地:首先我想说,我并不是要抛弃主语和宾语这些句法关系概念,只是说汉语没有把它们语法化,因此在汉语中找不到对应的东西。这些概念在我们的讨论中都有,但在考察个别语言时,要看这门语言的一些构式有没有呈现这个范畴,比如看是否有示证的标记,是否有时体的标记。这实际上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,要看每门语言的每个构式的具体情况。因此,这并不是西方不西方的问题,也不是简单的抛弃。

关于论元,我自己也提到过几次。汉语比较灵活,没有严格的论元结构,但要区分两个方面:一个是看在具体的构式中,有哪些具体的论元出现了;另一个是看这些论元出现在构式的什么位置。英语的论元结构和论元在句子里的位置有密切关系:在一般的句子里,如果是施事者,就得出现在动词前面;如果是受事者,就得出现在动词后面。汉语没有这些限制,所以在研究汉语时,这两个问题需要分开讨论。比如“吃”可以构成“吃鸡、吃饺子、吃筷子、吃大碗、这锅饭吃了十个人”等,几乎各种论元都可以出现在动词后面。而英语只有有限的论元可以出现,如果不是直接宾语,其他论元一定要通过介词引入。例如“*We eat in a restaurant*”(我们吃餐厅)一定要用介词,不能说“**We eat restaurant*”。所以每种语言的情况都不一样,我觉得还是要实事求是,按照具体语言的情况来分析。

赵先生之所以把动词后面的所有语义角色都当作宾语,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他没有语义角色的概念,另一方面是因为没有形态句法策略来区分这些不同的语义角色。从描写语言学的角度来看,如果没有形式上的差别,就无法在你的范畴体系内建立不同的分类。

杨旭:但是许多中国学者习惯了使用这些概念,包括词类、主语、宾语等句法成分,以及新引入的论元结构、语义角色。您现在主张这些概念似乎不适用于汉语,但如果大家不使用这些术语,而且又暂时想不到其他分析汉语的方式,那么似乎就很难讨论汉语了。当然,您提到信息结构理论是可以分析汉语所有句型的,所以现在只剩下信息结构了吗?

罗仁地:要按照语法化的范畴来分析一门语言,不要将其他语言的范畴强加于汉语,尤其是在没有证据支持的情况下。如果我说汉语没有主语和宾语,是因为没有证据表明汉语已经语法化了这些构式。所有的语法都是语法化的结果,每种语言的语法化过程都不一样,所以不同语言语法化了不同的范畴,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。

那么句子的组织原则是什么呢?我认为是信息结构。用信息结构来分析汉语句子是很有用的,而使用主语和宾语的分析方式则效果不佳。尽管赵先生将动词前面的所有论元都称为主语,将动词后面的所有论元都称为宾语,但这样很难真正理解汉语的真实情况。当然,汉语中有些语法现象,比如类别词(classifiers),是已经语法化了,而其他语言则没有,比如英语就没有句法形式证明类别词已经语法化,因此我们在讨论英语时就不需要讨论。同样的道理,汉语中没有句法形式证明其语法化了主语和宾语这些句法关系构式,那么为什么要使用这些术语呢?

多年前我在北大做报告时,有人问我:如果不用“主语”这个术语,我们怎么讨论汉语呢?他们习惯于使用这个术语,赵先生也是用这个术语,吕叔湘也是用这个术语,但他们对“主语”的定义是“话题”,所以“主语”的使用很容易让人误解。比如许多人就误解了李讷(Charles N. Li)和汤姆森(Sandra A. Thompson)的文章(Li & Thompson, 1976),他们提到的分析基本上是赵先生的思路,但有一点不同,是他们已经有了语义角色的概念,把施事者叫作主语。他们说得很清楚,这个主语不像英语中的句法关系,而是一种语义角色。可是很多人,尤其是形式派的学者,误以为汉语的“主语”和英语的“subject”是完全相同的,这实际上是一个严重的误解。

杨旭:关于主动、被动和“把”字句、“被”字句的问题。黄廖版《现代汉语》几乎把前者和后者等同处理,但您屡次强调汉语没有主动和被动的语态(voice),根源于汉语的无标记的话题-述题结构,以及汉语动词所示动作没有方向。“把”和“被”的作用仅仅是提示动作方

向,此外还用来识别指称、兴趣或伤害的功能。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分析“把”字句和“被”字句?尤其是“被”字句?未来的方向或方法是什么?

罗仁地:从语法化的趋势来看,汉语“被”字句的用法越来越像英语的被动句。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,“被”字句的句法结构和功能都有所不同。最初,“被”字句的用法是非常有限的,通常只用来表达不好的事情。但到了近代,因为受到英语和其他西方语言的影响,人们用“被”字句来对译其他语言中的被动句,因此“被”字句的使用范围逐渐扩大,现在的用法越来越接近英语的被动语态。

问题在于,汉语本身并不需要这种被动结构,刚开始是为了翻译外文,但现在变成习惯,常常用“被”字句来表达类似英语的被动句的意思,但从类型学来讲,“被”字句并不是被动语态。它越来越变成普遍的用法是在非施事者当话题的时候可以加“被”。可是赵先生那时的看法是,“被”字句的一个用法是用来标识动作方向的,但其实它还有其他的用法。赵先生认为“被”字句不是必要的,只是为了表达得更清楚一点,在及物句的动词前面加上“被”字,而不出现在非及物的句子里面。他也可能是受一般的被动语态的分析的影响。但是书里讲得很清楚,同样的意思其实不一定需要“被”字句,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表达(Chao, 1948: 35; 1968: 70—71; 2011: 95—96)。所谓的“不需要”是因为被动句的用法是切换功能所指追踪系统(switch function referent tracking system)的一部分,但汉语没有语法化切换功能所指追踪系统,所以没必要用“被”字句来保持某所指的话题性质(有关所指追踪系统的类型,可以参考 Comrie, 1989、1994、1999; Van Valin, 1987)。

赵先生对“把”和“被”的分析很类似,他叫作“pretransitive”标志,即出现在及物动词前面分辨动词所示动作的方向。形成的构式都是话题-述题结构。“把”字句构式除了主要话题,还有次要话题,就是“把”字后面提到的所指。这些构式习俗化了以后,还发展了你刚才提到的功能。

杨旭:最后一个问题。您在讲座中提到,过去除了吕叔湘先生,没有多少学者了解或应用赵先生的观点。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赵先生了。

罗仁地:现在确实有一股“赵元任热”,这要归功于石锋教授。他一直在倡导学习赵先生的理论。除了会议以外,还有很多围绕赵先生的群聊,讨论都非常活跃。我几乎每天都在看这些讨论。如果哪天没看,就可能错过 200 多条信息,很难赶上。我从这些讨论中学到了很多,觉得受益匪浅。

杨旭:谢谢罗老师接受我的采访!

罗仁地:不客气!

参考文献

- 陆俭明 2016 《要重视语言信息结构的思考与研究》,《汉藏语学报》第 1 期。
罗仁地 2023 《赵元任先生的句子和论元结构概念》,《实验语言学》第 4 期。
罗仁地、潘露莉 2022 《焦点结构的类型及其对汉语词序的影响》,徐烈炯、潘海华主编,《焦点结构和意义的研究》(增订本),上海:上海教育出版社。
石锋 2023a 《赵元任的方向就是中国语言学的方向——石锋教授在首届赵元任语言学学术思想国际

- 研讨会闭幕式上的发言》，微信公众号“实验语言学”2023年09月02日。链接：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ddbk2QKzsiBe_DzA1LWhew。
- 石 锋 2023b《重新认识赵元任——〈赵元任日记〉出版》，《光明日报》2023年8月24日16版。链接：<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jlaujPvPYgyLW8Gayv2jjw>。
- 赵元任 2023 《连续性——方法论的研究》，石锋、潘韦功译，上海：上海教育出版社。
- Chao, Y. R. 1948[1967] *Mandarin Primer: An Intensive Course in Spoken Chinese*. Cambridge, MA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.
- Chao, Y. R. 1968 *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*. Berkeley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.
- Chao, Y. R. 2011 *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*. 北京：商务印书馆。
- Comrie, B. 1989 Some general properties of reference-tracking systems. In D. Arnold, M. Atkinson, J. Durand, C. Grover, and L. Sadler (eds), *Essays on Grammatical Theory and Universal Grammar*, 37—51. Oxford: Clarendon.
- Comrie, B. 1994 Towards a typology of reference-tracking devices. Paper presen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anguage Typology, University of Tsukuba, January 1994.
- Comrie, B. 1999 Reference-tracking: Description and explanation. *Sprachtypologie und Universalienforschung*, 52(1): 335—346.
- Gundel, J. K. 1988 *The Role of Topic and Comment in Linguistic Theory*. New York: Garland Pub.
- Halliday, M. A. K. 1967 Notes on transitivity and theme in English: Part 2. *Journal of Linguistics*, 3(2): 199—244.
- Halliday, M. A. K. 1994 *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*. London: Edward Arnold.
- Lambrecht, K. 1994 *Information Structure and Sentence Form*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
- LaPolla, Randy J. 2006 Chao, Yuen Ren (1892—1982). In Keith Brown (ed.) *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*. 2nd Edition. 295—296. London: Elsevier.
- LaPolla, R. J. 2017 Chao Yuen Ren [Zhào Yuánrèn 趙元任] (1892—1982). In R. Sybesma (ed.), *Encyclopedia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*, 352—356. Leiden: Brill.
- Lehmann, C. 1985 Grammaticalization: Synchronic variation and diachronic change. *Lingua e Stile*, 20(3): 303—318.
- Li, C. N. & Thompson, S. A. 1976 Subject and topic: A new typology of language. In C. N. Li (ed.), *Subject and topic*, 457—489. New York: Academic Press.
- Sgall, P., Hajicová, E. & Panevová, J. 1986 *The Meaning of the Sentence in its Semantic and Pragmatic Aspects*. Springer Science & Business Media.
- Vallduvi, E. 1992 *The Informational Component*. New York: Garland Pub.
- Van Valin, R. D. Jr. 1987 Aspects of the interaction of syntax and pragmatics - Discourse coreference mechanisms and the typology of grammatical systems. In J. Verschueren & M. Bertuccelli-Papi (eds.), *The Pragmatic Perspective*, 513—531. Amsterdam and New York: Benjamin's Pub. Co.
- Van Valin, Jr, R. D. & LaPolla, R. J. 1997 *Syntax: Structure, Meaning, and Function*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

(杨 旭 武汉大学文学院、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430072；
罗仁地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4105)